

滕代远传



《滕代远传》写作组
解放军出版社

滕代遠傳

陳中平



解放军出版社

滕代远传

《滕代远传》写作组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海军四二二九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11 插页 288 千字

1990 年 11 月第 1 版 199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6 700

ISBN 7-5065-1380-3 / K.112

定 价: 6.90 元

5.08.12.1



△ 1949年于军委铁道部



△ 1930年攻克长沙后，滕代远（中左六）与何长工（中左四）、袁国平（中左五）、吴溉之（中左七）等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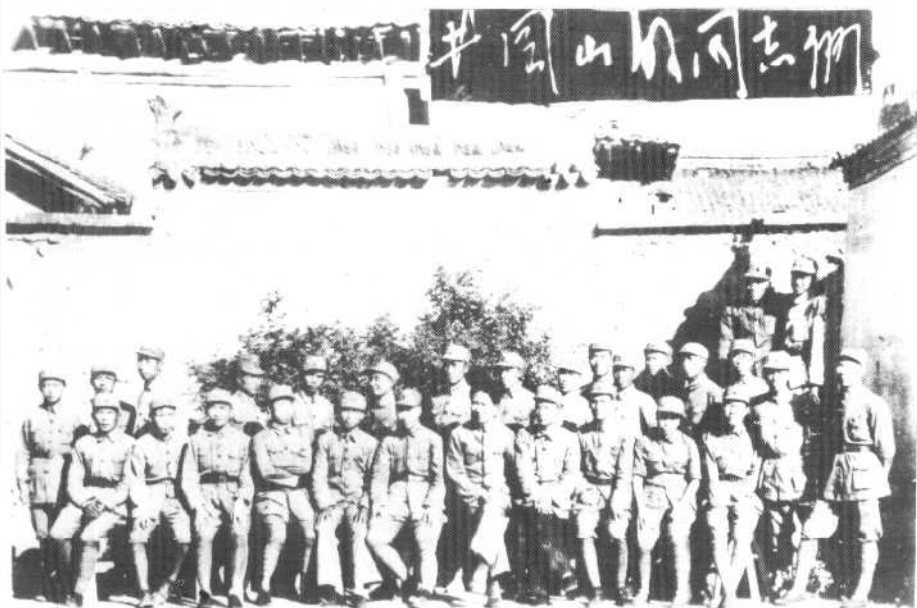
△ 1933年11月，在福建省建宁县。由左向右：叶剑英、杨尚昆、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袁国平。

红军三军团司令员 和三个政治委员



△ 1938年，彭德怀与先后任红军三军团政委的滕代远、杨尚昆、李富春在延安合影。

◁ 1937年，滕代远和邓发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合影。



△ 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于1938年在延安合影，前左四为滕代远。



◁ 1938年于延安，自左向右：
邓小平、谭政、
陈云、罗荣桓、
罗瑞卿、王稼祥、
滕代远、贺龙、
李富春。



▷ 1938年9月与
出席中共六届六中
全会扩大会议的部分
同志在延安机场
合影。



◁ 1938年10月，
滕代远（前排左
二）与参加中共
六届六中全会扩
大会议的朱德、
谢觉哉、吴玉章、
林伯渠、徐特立
等合影于延安桥
儿沟党校。



△ 1938年，滕代远与毛泽东、刘伯承在延安机场。



△ 1938年在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参谋部驻地。



1939.11.10

△ 1939年在延安，滕代远（左二）与军委参谋部各局负责人合影。



△ 1939年，滕代远与夫人林一在延安土家坪。



△ 1939年冬，滕代远（中左八）到达晋西北，指挥反顽斗争中与贺龙（中左七）、关向应（前排）合影。



△ 1939年，在延安抗大与周文龙(左一)、袁子钦(左二)、胡耀邦(左四)、李志民(左五)、袁国平(左六)、江华(左七)合影。

▽ 1944年，在八路军前方总部，与邓小平参观英模展览。

▽ 1946年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欢送王震部南下开河和恢复抗
根据地在太行山区陶晋英



◁ 1947年于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滕代远（右二）与薄一波（左一）、王震（左四）、陈毅（右四）、杨秀峰（右三）、宋任穷（右一）等合影。

1947.11.30. 杨武安

▷ 1946年，邓小平、刘伯承、滕代远在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



◁ 1947年于太行山武安县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与陈毅合影。

▷ 1948年6月，
滕代远、聂荣臻、
薄一波在平山县
烟堡。



◁ 1949年于铁
道部与吕正操
(左)、武竞天
(右)合影。

▷ 1949年
12月9日，
送毛主席赴
苏联途中在
昂昂溪车站
留影。





△ 1952年11月2日，毛泽东视察黄河铁路大桥时，与滕代远及技术人员谈话。



△ 1962年，欢送二儿子久光参军时全家合影。

序 言

滕代远同志是我党的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我和代远同志共事多年，对他了解比较深。解放军出版社约我为《滕代远传》写篇序，故友情在，盛意难却。六年前，我和李达同志共同撰写过一篇纪念代远八十诞辰的文章，对他一生的革命经历、品质和精神，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已见诸报端。这里，再记述几件我与他接触的琐事，权充本书之序。

我和代远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1940年5月，正值粉碎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不久。当时晋西北的形势十分险恶。贺龙、关向应同志已率八路军一二〇师主力赴冀中作战。阎锡山在晋西北的旧军力量数倍于我，正加紧策划企图消灭这里的新军和八路军。晋西北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是党中央与其他根据地联系的通道。在这军情紧急的关头，代远同志受中央委派，到晋西北统一指挥反顽斗争。他很快就组成了晋西北行动委员会，依靠当地的牺盟会、新军的干部，把新军和八路军组织起来，分两路向顽军发动总攻，经过数天激战，给阎军赵承绶第七集团军以沉重打击，迫使其弃城仓惶南逃。经过五个月的艰苦努力，晋西北的局势稳定下来了，这时一二〇师主力也已经回来，党中央即电令代远同志到太行山八路军前方总部待命。

他在去总部的途中，经过晋东南决死一纵队驻地，我要留他在司令部多住上几天。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彼此有说不完的话，话题自然是关于这次反顽斗争。他对山西新军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和热爱。他谈到晋西南、晋西北的新军，在反顽斗争中，表现得很英勇、顽强，那些干部都是好样的。决死二纵队的同志们警觉性高，当旧军设下圈套，与日军形成前后夹击，企图消灭他们时，他们及时识破了阴谋，未中奸计。后来，阎锡山命令陈长捷率六十军、十九军，在日军的配合下对他们进行所谓“讨逆”，他们苦战兼旬，转移到晋西北的临县，保存了革命力量，避免了重大牺牲。他又谈到晋西北新军暂一师师长续范亭，在兴县蔡家崖参加赵承绶召集的高级将领紧急会议，闻到了旧军要向新军开刀的火药味，便不顾个人安危，借故逃席，跃马奔赴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揭露了旧军的阴谋，使新军和八路军很快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代远同志在晋西北期间，还深入新军各部视察，具体帮助进行整训，提高新军的军事、政治水平。

代远同志在晋西北严格按中央指示办事，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既给顽军以沉重打击，又适可而止，以利继续保持与阎锡山的合作关系。我对他说，你这样做很对，我在晋东南反顽斗争中也是这样要求大家的。我们在一起认真研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处理此次事变的一系列指示，深感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十二月事变”发生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明确指示，一方面要我们对敢于进犯的旧军给予坚决还击，另一方面又要从抗日大局出发，继续争取阎锡山留在抗日阵营内。从这一策略原则出发，我和新军、牺盟会的其他领导人联名致电阎锡山，痛斥了旧军破坏团结抗日的罪行，但又表示为了“挽国运于垂

危，扶山西于将倾”，仍“忍痛不咎既往，再申和议”。不久，中央要我以个人名义再电阎锡山，建议新、旧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后来毛泽东同志派王若飞、萧劲光同志带着他的亲笔信到达秋林镇与阎锡山谈判，达成协议，恢复了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没有再敢轻举妄动。

1942年5月，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前总副参谋长左权同志不幸壮烈牺牲。中央决定代远同志担任前总参谋长，并任北方局常委，他再次来到晋东南。这时，我任太岳纵队政委兼太岳军区政委，因此和代远同志见面的机会就比较多。不过，我们真正在一起共事，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是军、政首脑，代远同志是军区副司令员，我是中央局副书记、军区副政委。不久，我们就紧张地投入了组织上党、平汉两个战役的工作。

在上党战役中，司令部分工由代远同志和我去冀鲁豫平原地区视察和指导工作，并顺道护送从延安同机来的林彪、陈毅等领导人，安全通过平汉路，分赴东北、华东战场。9月中旬，我们住在河南林县任村的八路军豫北办事处，适逢王定南同志来到这里。他带来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致彭德怀的亲笔信，并向我们介绍了高树勋的情况，以及高希望向我方靠拢的意向。我们感到这是一个重要军情，做好高树勋的工作，将直接关系到平汉战役的全局。我们告诉王定南同志，彭总已回延安，你可去涉县赤岸村，将书信径送伯承、小平同志。这件事，为后来发生在平汉战役中的“高树勋起义”起了小小的作用。

1946年初，党指定代远同志赴北平，协助叶剑英同志参加

由国、共和美国三方派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到当年秋天才回到晋冀鲁豫军区。这时，伯承、小平同志已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到鲁西北、豫东一带作战，我和代远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局和军区的日常工作。我们指挥留下来的部分兵力在内线对付敌人的进攻；组织地方兵团和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动员翻身农民参军，组织新兵团，为野战军补充兵员；为前方输送弹药、粮草、衣物等；领导进行农村土地改革和全区的生产建设。

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南下，挺进大别山。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折，从此，我军开始了战略反攻，把战争从根据地引向国统区。7月1日，在中央局和军区召开的纪念党成立二十六周年大会上，代远同志作了反感动员的报告。他明确而响亮地提出“大反攻的号角吹响了”，说明他对革命历史进程的分析和对刘、邓大军南下这一历史事件的估价，是独具慧眼、完全正确的。那一天，我外出，回到司令部听代远同志介绍后，我对他的这个提法表示赞成。不过，我对他说：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口号，由我们地方率先提出，是否妥当，我无把握。代远同志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建议向中央报告此事。这件小事虽然过去了四十多个春秋，但我一直记得。它既说明了代远同志的眼力，也说明了他的组织性、原则性是很强的，从中也看出我们俩在一起工作，关系是和谐融洽的。

刘、邓大军南下后，晋冀鲁豫地区的兵力就很薄弱了。除了抓紧其他各项工作外，最重要的就是着手组建新的纵队。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组建了八、九、十、十一、十二等五个纵队。这些纵队，有的很快就开赴前线，补充到刘、邓大军，有的留在后方，进行内线作战。这时，徐向前同志